

- ◎上海市“十二五”重点图书
- ◎当代中国经济实证分析丛书
- ◎本项目获支持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资助



中国高储蓄现象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汪伟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十二五”重点图书

◎当代中国经济实证分析丛书

◎本项目获支持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资助



中国高储蓄现象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汪伟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高储蓄现象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汪伟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8

(当代中国经济实证分析丛书)

ISBN 978-7-5642-2185-0/F · 2185

I .①中… II .①汪… III .①储蓄-研究-中国 IV .①F83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8189 号

责任编辑 袁春玉

封面设计 朱建明

责任校对 卓 妍 林佳依

ZHONGGUO GAOCHUXU XIANXIANG DE LILUN YU SHIZHENG YANJIU
中国高储蓄现象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汪 伟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 @ 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10mm×1000mm 1/16 20 印张 276 千字
定价: 45.00 元

前 言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依赖高储蓄、高投资与高外部需求的增长策略成就了经济增长的奇迹。这种策略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使中国经济陷入内外失衡的困境：外部失衡表现为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内部失衡表现为经济结构不合理，过度依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要素价格与资源配置存在深层次矛盾。在内外失衡的格局下，步入经济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在受到挑战。

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相比上升了约 19 个百分点，而且 2000 年以来的上升趋势更加明显，近年来一直维持在 50% 以上。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起飞本身需要较高的资本积累，从而在一定时期内需要牺牲消费需求。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都经历过低消费、高储蓄与高投资阶段，中国也不例外。但与世界主要代表性国家的储蓄率相比，中国的储蓄率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也明显高于新型经济体和具有高储蓄、低消费传统的东亚国家与地区。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后期，但储蓄率却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态势，这说明中国偏离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储蓄率变化的一般规律和标准结构。中国自 2010 年开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水平排在世界 100 名左右，远低于工业化国家，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众所周知，中低收入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需要进行大量的投资，对国外资金有很强的依赖性，但高储蓄却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这一巨大反差显然难以用传统的智慧来解释。中国异乎寻常的高储蓄率成为国内外

中国高储蓄现象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学者研究的焦点,也是我感兴趣的研究领域。近年来,我一直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试图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之谜”。

本书对中国高储蓄现象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以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以及各种消费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运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世代交替模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动态面板等建模技术与计量方法,从政府、企业、居民三部门储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结构变化、收入不平等、目标性储蓄、消费习惯、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货币政策与金融环境等方面探讨了中国高储蓄现象形成的原因,在理论研究与实证结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特征化事实展开分析,试图通过合乎逻辑的论证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与启示。

本书第一章提出了研究的主题,明确了研究的目标与框架,阐述了研究的思路与主要观点并交代本书的创新点。本书第二章通过对部门储蓄率的测算,告诉我们总的国民储蓄率与分部门储蓄率到底有多高,然后通过对改革开放前后储蓄率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可能的解释因素。本书第三章是通过对高增长、高储蓄、人口结构变化与高储蓄等特征化事实的考察,以生命周期理论为理论基础展开计量分析。本书认为常常被人们忽视的两大因素,即经济增长与人口结构变化是中国国民储蓄率上升的最主要决定因素。中国收入不平等状况日益严峻,事实上,当前中国过高的储蓄率很可能是收入不平等加剧以及居民的目标性储蓄造成的。让人望而生畏的房地产价格,高昂的教育和医疗费用,以及教育与医疗方面公共服务的缺失都会提高人们的消费标准。在房价、医疗和教育费用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中低收入居民为了应对未来发生的婚嫁、购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大额支出,不得不尽可能压缩当前消费、提高储蓄。本书第四章从收入不平等强化了居民的目标性储蓄的视角对上述特征事实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理论与实证解释。因为居民部门是最为重要的消费与储蓄主体,而且许多消费理论适合于对居民储蓄行为的讨论,所以本书第五章、第六章检验了短视行为、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消费习惯、刚性储蓄等理论对解释中国居民消费(储

蓄)行为的适应性,并分析在货币政策下,这些因素通过何种方式发挥作用,货币政策是放大还是减弱了这些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同时对高储蓄现象做进一步解释。基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收紧、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与消费率同步下降的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征事实,本书第七章从企业的异质性及其面临的金融环境差异出发,构建了一个包含国有和中小(民营)两类企业且后者面临借贷约束与投资扭曲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同时在校验模型现实解释能力的基础上进行了传导机制分析与实证研究,并从金融扭曲的视角揭示了如下现实: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金融环境变化所导致的企业微观行为变动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和消费率同时下降、企业储蓄高企的重要原因。高储蓄、低消费的成因呈多维度,到底什么样的政策对启动消费需求是长期有效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实证问题,本书第八章对农村税费改革这一政策试验的消费刺激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政府通过永久性的减税来增加居民持久性收入进而扩大消费需求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从而为实施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本书第九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目前,中国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本书对中国储蓄率的决定因素以及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希望本书的研究结论能为中国科学制订政策并顺利启动消费需求、促进经济转型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本书是在我的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中国高储蓄、低消费问题研究》与我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高储蓄现象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成书之际,我要感谢我的合作者艾春荣教授、郭新强博士,他们是本书一系列研究的主要合作者。曹晖博士、钱文然硕士在数据、文献和资料的收集方面提供了帮助,在此表示感谢。本书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杂志上,在此,要感谢这些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感谢上海财

中国高储蓄现象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经大学财经研究所为本书出版提供经费和支持,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黄磊主编、陈明主任为本书的出版所做的优秀策划工作,感谢责任编辑袁春玉、美术编辑张克瑶的细致工作。

本书的部分成果获得财政部第五次财政理论优秀科研成果奖以及上海市第11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感谢评奖委员会的专家与评委对本书研究成果的肯定。本书的出版还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CJL014)、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NCET-13-0891)、上海市曙光计划(12SG33)、上海市文化创意重点项目(2014111029)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此外,感谢胡景北教授对本书申请各种研究资助所提供的推荐与帮助。

另外,我还要深深感谢我的家人。我所取得的每一点成功,总是伴随着亲人的鼓励、关怀和理解,这份亲情和期望是我永远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汪伟

2015年6月

目 录

前言/1

第一章 导论/1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1
- 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目标/6
- 第三节 行文思路与研究框架/9
- 第四节 本书创新点/10

第二章 中国高储蓄率现象的部门分析/12

- 第一节 引言/12
- 第二节 中国部门储蓄率的测算/16
- 第三节 中国储蓄率变化的部门分析/30
- 第四节 中国储蓄率的未来走势展望/46
- 第五节 本章结论与政策启示/47

第三章 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49

- 第一节 引言/49
- 第二节 文献综述/51
- 第三节 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54
- 第四节 计量方法与估计结果/61
- 第五节 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分析/72

中国高储蓄现象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第六节 本章结论与政策启示/77

第四章 收入不平等、目标性消费与中国高储蓄/80

- 第一节 引言/80
- 第二节 文献综述/84
- 第三节 理论模型/91
- 第四节 实证分析/99
- 第五节 本章结论与政策启示/115
- 第六节 附录/116

第五章 短视行为、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动机、习惯偏好与中国居民低消费/122

- 第一节 引言/122
- 第二节 文献综述/124
- 第三节 理论基础、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127
- 第四节 计量分析/136
- 第五节 本章结论与政策启示/147

第六章 刚性储蓄、货币政策与中国居民消费抑制/149

- 第一节 引言/149
- 第二节 基于 SVAR 模型的经验事实/153
- 第三节 基于刚性储蓄的动态新凯恩斯主义模型/159
- 第四节 数值模拟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析/166
- 第五节 本章结论与政策启示/176
- 第六节 模型附录：模型推导与求解/178

目 录

第七章 融资约束、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中国低消费/196

- 第一节 引言/196
- 第二节 理论模型/203
- 第三节 模型校验与传导机制分析/214
- 第四节 实证分析/224
- 第五节 本章结论与政策启示/236
- 第六节 附录/237

第八章 启动消费需求的政策实践：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例/252

- 第一节 引言/252
- 第二节 计量模型设定、估计方法与数据描述/256
- 第三节 估计结果与稳健性检验/261
- 第四节 分地区、消费类型估计结果/271
- 第五节 税费改革对消费的刺激效果持续性分析/278
- 第六节 本章结论与政策启示/281

第九章 全书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282

- 第一节 全书结论与政策启示/282
- 第二节 未来研究展望/286

参考文献/288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 GDP 每年平均以 9.6% 的速度增长,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是国民储蓄率的大幅提高。据中国银行课题组(1999)的测算,1978 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较发达国家储蓄率高出十多个百分点,储蓄倾向明显高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Kraay(2000)研究发现,1978~1995 年中国的平均国民储蓄率为 37%,而国际平均储蓄率仅为 21%。Modigliani 和 Cao(2004)用个人拥有财富改变量作为居民储蓄的度量,测算出了 1953~2000 年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他们回顾了新中国居民储蓄的历史,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节俭”的中国人并不那么节俭,因为居民平均储蓄率低于 5%;但到了 7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加速推进,储蓄率却稳步上升,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远低于工业化国家,然而他们估计 1994 年中国居民储蓄率接近 34%,与日本 20 世纪 60 年代的情况相似,他们称之为“中国储蓄之谜”。事实上,至少从 2000 年开始,中国就成为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2000年以后,中国储蓄率持续高涨,Louis Kuijs(2005,2006,世界银行工作论文)用资金流量方法测算了中国1990~2004年的国民投资和储蓄率,发现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维持在40%上下,1994年和2004年的国民储蓄率更是分别高达42.7%和43.5%。本书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年鉴推算发现,从2007年开始,中国的储蓄率已经超过50%,2010年更是达到惊人的52.6%,这是全世界的最高水平。中国自2010年开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众所周知,中低收入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需要进行大量的投资,对国外资金有很强的依赖性,但高储蓄却使中国2000年以后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中国的资本输出主要是购买美国债券,然后将美国债券用美元存入美国银行,美国的银行再投资到中国的工厂、制造业等。中国的国内投资率非常高,甚至达到了惊人的48%的水平。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但中国储蓄净剩余却一直保持持续增长:2000年为1.9%,到2008年达到7.9%,近几年来储蓄净剩余虽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月,我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已达到惊人的48.9万亿元^①,而且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这一巨大反差显然难以用传统的智慧来解释。

中国异乎寻常的高储蓄率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1 000个经济学人可能会有1 001个答案,本书试图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给出自己的解答。导致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中,高增长本身就可能导致高储蓄。另外,从居民的消费行为来看,低消费的原因很可能由于居民的消费短视、流动性约束以及对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消费习惯等造成的。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贫富差距拉大以及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等因素也很可能是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企业储蓄率的上升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变化会影响储蓄:处在较快增长经济中的年轻人比

^①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www.pbc.gov.cn),Wind金融数据库。

处于负储蓄状态的老年人显得更加富裕,从而更多地储蓄,相应地,也比处于较慢增长经济中的个体有较高的储蓄率(Modigliani, 1970, 1986)。70年代后期开始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伴随着中国社会和劳动力的一些特征,使前所未有的爆炸式增长模式成为可能,而爆炸式增长很可能导致中国储蓄率的不断上升。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居民的消费行为会随着体制变革而发生相应变化。事实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制度变迁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经济环境的改变迫使居民更关注长远利益,其消费的增减不会像绝对收入假说描述的那样完全取决于当期收入的变化;另一方面,人们对相对遥远的信息不太了解或难以获得,因而难以预测遥远的未来的收入和支出,他们进行消费决策时往往只能依据当前的收入与已有的流动性资产(如储蓄存款等)以及近期可以预测的未来收入(汪红驹和张慧莲,2002)。因此,在转型经济中,消费者难以根据其终生的资源来合理规划其不同阶段的消费和储蓄,从而不能均匀地消费其一生的收入和财富,他们常常只能进行分阶段决策,规划当前与“最近的未来”之间的消费,这些情况说明消费者很可能存在着“短视”消费行为(余永定和李军,2000;叶海云,2000)。正是由于中国居民可能存在短视行为而不能根据其一生的持久收入安排消费,从而可能导致消费持续走低。^①

同时,中国当前的信贷市场极不完善,低收入消费者往往受到严重的信贷约束,消费信贷对他们来说常常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消费者除了为通常的大宗耐用消费品的购买而储蓄之外,医疗支出、购房、子女教育、婚嫁都会由于受到融资约束而不得不进行日积月累的储蓄(余永定和李军,2000)。一般来说,流动性约束的当期存在会使居民的消费比他们希望的少;另外,由于心理上可预见的未来外部融资困难,他们也往往降低现期消费,进行储

^① 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中,当消费者的收入处于上升阶段时,一个完全远视的消费者会立刻开始增加他的消费支出,以便享受未来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显然,这一预测结果并未在中国出现。因此,笔者认为消费者的短视行为可能是其原因。当然,消费者的短视行为可能导致短期消费偏高或者偏低,但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是消费持续走低,笔者认为后者是其主要表现,后文将展开计量实证分析。

蓄与财富积累,这些都可能造成中国居民的低消费倾向。

人们的生活随时可能受到各种意外事件的影响,从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些意外冲击可能来自经济结构调整、宏观经济的景气变化,也可能来自世界金融危机的传染等。家庭没有预期到的收入减少(如下岗)或意外的支出增加往往就是这些经济冲击所带来的直接后果(齐天翔,2000;施建淮和朱海婷,2004)。由于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会因此而增强,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居民一般对自己的预期收入的估计更为保守,为防范不确定事件而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就显得非常强烈,这很可能是中国居民消费倾向偏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居民的消费习惯也可能是造成低消费倾向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人们对以前的消费存在心理依赖,他们通过一段时间形成偏好,而这种偏好的形成是通过与同伴和自己过去的消费决策的比较形成的,这使得人们当期的效用水平不仅依赖于当期的支出水平,而且也受制于在前期已经形成的习惯的影响。由于长期形成的低消费、高储蓄的习惯难以打破,即使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消费者由于消费的惰性而不愿扩大消费,因而使得需求热点难以启动。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部分居民的生活逐步达到小康水平,这意味着家庭消费决策的灵活性大大提高,使得居民具备了跨期选择消费的可能。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无论是城乡间、区域间还是各社会阶层间的居民收入差距都呈迅速扩大的趋势(王小鲁和樊纲,2005)。消费者之间收入水平差距越大,其消费行为出现差异的可能性也会越大。一般来说,富人的消费倾向低于穷人的消费倾向,经济中的收入差距越不平等,总的消费率就越低。

中国从30多年前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严格的人口政策使普通家庭的孩子数急剧减少,城镇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已经凸显,养老问题也变得日益严峻起来(袁志刚和宋铮,2000;汪伟,2009,2010)。由于养老保险制度

尚未有效建立,人口政策渐渐打破了传统家庭子女赡养老人模式的作用,并且近年来抚养孩子的成本不断上升,从而鼓励个人进行积累。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很可能是导致居民消费走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随着企业体制改革深化,预算软约束逐步“硬化”,买方市场逐步形成,企业的效益有了明显改善,企业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加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后,金融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银行信贷变得谨慎,银行倾向于对国有企业和内部资金雄厚的大型(民营)企业发放贷款,大量中小(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主要依赖其利润留成进行内部投资,因而企业储蓄在国民储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这可能也是中国国民储蓄率上升的不容忽视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增加的利润较少分配给家庭,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持续下降(Kuijs, 2006; 李扬和殷剑锋, 2007)。近年来,国民收入过度向政府倾斜,导致政府的储蓄率又有了重新走高的趋势,这可能也是导致中国储蓄率在高位持续的原因之一。因此,从中国的金融市场环境和部门储蓄率的变化角度进行探讨,可能成为解开中国高储蓄谜团的重要研究方向。

从政府制定政策的角度来看,如果消费者的“短视”与流动性约束是引起消费走低的主要原因,政策的重点应该是从根本上消除使居民产生短视行为的制度因素,尽快地建立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帮助居民缓解由于短视行为与流动性约束而不能平滑一生消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如果消费者的预防性动机的强度很高并因此而消费不振,政策导向则应当是以增加居民的收入为根本途径,消除各种影响收入增加的不确定性因素,切实降低各种政策性负担,构建起各种保障体系,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如果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是低消费倾向的主要原因,政策的重点应当是帮助居民改变旧的消费观念,倡导新的消费理念,鼓励居民追求科学、平衡和合理的消费,从而启动消费热点。如果消费走低的原因主要来自贫富差距过大,政府则应当在税制上进行调整,而如果人口年龄结

构变化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则应当从人口政策上做一些调整。如果金融市场扭曲是企业高储蓄、居民低消费的主要原因，则应当对金融体制和企业的分红制度进行改革。总之，高储蓄、低消费的成因呈多维度，破解的政策也应是全方位的。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与一直保持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是分不开的。但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单纯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成分已经出现了显著降低；另外，由于受到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与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也显著减弱，并且由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积累的经济风险在不断累积。消费疲软一直是我国可持续增长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揭示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深层次原因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同时，对于中国储蓄率的决定因素以及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进行深刻而细致的数量化分析将会为我国科学制定政策并顺利启动消费需求、成功实现经济转型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目标

1. 由于统计数据的缺失，以往的研究对中国部门储蓄率的历史变迁及其原因少有研究，因而无法勾勒出一个中国部门储蓄的总的图景，因此测算并分析中国部门储蓄率对解释中国超高储蓄率很有必要。本书试图测算1952~2010年中国居民、政府与企业三部门的储蓄率，并分析各部门储蓄率的变化及其原因。

2. 文献中关于幼年人口抚养比率和老年人口抚养比率对储蓄率的贡献大小与方向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也缺乏对中国人口转型中各变量的作用机制的细致讨论。另外，以往研究均没有考虑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对储蓄率的交互影响，而这些交互影响恰恰反映了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对储蓄率上升的长期作用机制，对得到所研究问题的结论及其政策含义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以往的研究忽视了诸多潜在影响储蓄率的因素,所得到的结论是否稳健也并不清楚。本书研究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增长及其交互作用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评估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生育率的外生变化与市场化改革政策带来的高增长对中国储蓄率上升的作用机制。

3. 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无论是城乡间、区域间还是各社会阶层间的居民收入差距都呈迅速扩大的趋势(王小鲁和樊纲,2005)。日益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可能正是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的内在原因(朱国林等,2002)。事实上,一方面,高收入阶层本身就有较高的平均储蓄倾向;另一方面,在房价、医疗和教育费用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中低收入居民为了应对未来发生的婚嫁、购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大额支出,不得不尽可能压缩当前消费、提高储蓄目标,造成他们甚至会比富人有更高的储蓄率。然而,从收入不平等与目标性储蓄的角度对中国高储蓄率进行解释的建模性理论与实证研究却相当欠缺。本书试图从收入分配不均强化了居民的目标性储蓄动机入手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揭示收入分配扭曲可能正是中国储蓄率上升的原因。

4. 在关于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内在原因的讨论上,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也缺乏对各种可能造成居民消费意愿不强的原因的细致讨论,如短视行为与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从结果上都会导致消费的过度敏感与消费倾向下降,如何区分二者的影响却很少有人研究。本书试图检验各种消费理论对中国居民行为的适应性,如消费短视理论、流动性约束理论、损失厌恶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行为习惯理论等,并以此来揭示居民消费率偏低背后的行为动因。

5. 目前关于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成因,学界已有多方面的讨论,所开出的“药方”虽不尽相同,但主流的思路是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去刺激居民消费,如减税、增加工资、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等。然而,面对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世界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不仅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更重要的是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